

近世日本的祭孔与统治者

邢 永凤·李 月珊

摘要：在儒家礼仪中，祭孔是最重要的仪式之一。祭孔仪式在亚洲各国至今仍然普遍存在，祭孔的历史亦是东亚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历史，对祭孔的研究有助于探讨儒家文化的普遍价值，进而促进东亚各国的相互交流与理解。在近世日本的祭孔活动中，从幕府将军到地方大名都积极地支持并参与其中，可见日本的统治者希冀通过祭孔、尊孔，实现教化、教育，以加强其政治统治。

关键词：近世日本 祭孔 将军 大名

在儒家礼仪中，祭孔是最重要的仪式之一。祭孔仪式在亚洲各国至今仍然普遍存在，像我国曲阜的孔庙、日本的汤岛圣堂、韩国的成均馆等。祭孔的历史亦是东亚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历史，同样的文化现象预示着相同文化价值的认同。对祭孔的研究有助于探讨儒家文化的普遍价值，进而促进东亚各国的相互交流与理解。

然而，长期以来儒学研究领域关注儒家学说的研究，对祭孔仪式的研究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对祭孔这一集政治性、教育性、宗教性为一体的仪式进行研究，可以探明日本儒学的实态，进而思考儒学对当今东亚以及全世界发展所能发挥的作用。

从现有文献看，日本是中国以外最早建立孔子庙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祭祀孔子的国家。在公元701年（大宝元年），日本就开始祭祀孔子，而且是在国家最高学府的大学寮内。后经战乱期一度消失，直到近世时期才重新出现。在近世时期，遍布日本各地的290多所藩校和170多所乡校中，多建有孔子庙并专门辟有祭祀孔子的场所，祭孔活动在日本盛极一时。

但另一方面，在古代中国与朝鲜，祭孔仪式——释奠礼是国家礼制体系的一部分，其代表的道统对王权既有支持作用，又有限制作用，儒学在国家具有权威性地位。在近世日本祭孔仪式虽没有强制推行，但同时却能发现日本统治者参与祭孔活动的记录。可以说近世日本祭孔活动的兴起，离不开统治者的支持。本文将考察近世统治者支持祭孔的事实，同时考察祭孔活动对其政治统治所起到的作用。

一、德川义直与孔庙

德川义直（1600-1650），字子敬，是德川家康的第九子，官至二位大纳言，被封为尾张藩主，他

自幼修儒学，尊师重道，其藩中多名儒官，像有名的崛杏庵、武野安宅等，并曾重用赴日名儒陈元赓。并广搜典籍，建立神儒合一的藩学。在藩主中，被尊为贤明之君。在近世日本祭孔的活动中，德川义直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曾受教于林罗山，1622（元和8）年德川义直请求广岛浅野家，将其儒臣堀杏庵迎至名古屋，给与7百万石的待遇，作为藩儒优待¹。

1634（宽永10）年德川义直率先在名古屋城内设立孔子堂。关于孔子堂的样子，1630（宽永6）年罗山在从京都返回江戸的途中拜访名古屋城时曾做过记述。《罗山林先生文集》卷69“拜尾阳圣堂”记载：

乙巳十二月六日，赴尾州，奉谒亚相，坐定而后拜孔子堂，蔚绘涂小厨子形如堂在奥，有金像尧、舜、禹、周公、孔子，安其中（中略），左右壁画五色乐器具，其圣像厨前垂，金襴帳，其堂有两扉，筑石为基，高于地四五尺许，堂下有花坞数亩，其傍有文库，书籍殆及一千部，……²

从以上记述来看，孔子堂的规模并不大，其中置有尧、舜、禹、周公、孔子五位先圣的金像。孔子堂的旁边设有书库。关于孔子堂具体是在什么年代建造的，现在暂无史料可考。德川义直曾在孔子堂举行过祭孔仪式。《新川本敬公实录》的《敬正二祖杂记》中载有举行释菜礼时的祭文：

宽永十年（1634）二月十八日，从二位权大纳言源义直，敢昭告于先圣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纵，诞降生知，经纬礼乐，阐扬文教，馀烈遗风，千载是仰，俾兹末学依仁游艺，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祇奉旧章，式陈明荐，以先师颜子等配坐，尚飨。

宽永十年二月十八日，从二位行权大纳言源朝臣义直，昭告于先师颜子，爰以二月十八日，率遵故实，敬修释奠于先圣文宣王，惟子等或服膺圣教，德冠四科，光阐儒风，貽范千载，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式陈明献，从祀配神尚飨。³

可见当时主祀孔子，以颜子从祀，沿用的是《延喜式》中的规定，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关于孔子的从祀问题，义直还曾与足利学校的庠主发生过议论。1636（宽文13）年4月，德川义直在参拜日光神社的归途中派儒臣堀杏庵前往足利学校，对当时的庠主睦子讲道：

先圣之画像并颜回子路之画像，以子路像可为闵子騫旨亚相君之所宣，况延喜式之所记岂及异

¹ 和島芳男「徳川義直の好学と林門の発展」大手前女子大学論集13, 1979. 76頁。

² 另据《敬公时代御记录》载：十二月六日，林道春名古屋に相越、登城御逢有之、聖像拝礼、毕而御飨应。与罗山记述一致。

³ 《新川本敬公实录》61~62页

议哉。⁴

在这里，德川义直对孔子堂的从祀有自己的意见，认为应将子路像改为闵子骞像。为何义直会持有这样的意见，在这里笔者推测孔门“十哲”中闵子骞以德行与颜回并称，以孝著称。义直尊闵子骞，可能与重视“孝”这一德行有一定关联。关于这一点将在今后做进一步考察。

德川义直对祭孔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支持林罗山创建忍冈先圣殿。宽永7（1630）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赐予林罗山江户城北的上野忍冈之地，并赐金二百两，以经营学寮，建立塾舍和书库。⁵ 宽永9（1632）年，德川义直帮助林罗山在忍冈建立了孔子庙，即“先圣殿”。据《昌平志》记载：

九年壬申冬，尾张源敬公（义直）捐数百金，即其宅地创造庙宇，奉安宣圣及颜曾思孟诸像，且置俎豆，令信胜以时致祭，又书殿额命官匠平内大隅，镌以揭焉，其庙制多处于公之规画云。⁶

也就是说，德川义直为孔庙的建立提供了资金、孔子像、四配像、祭器等，其中，孔子像是德川义直托七条佛师康音制作的。义直还亲题“先圣殿”三字。宽永10（1633）年，林罗山在忍冈先圣殿首次举行祭孔典礼，此后这一仪式得以延续。

二、德川光国与祭孔

德川光国是江户时代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藩主，是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日本关于他的传说可谓汗牛充栋，有名的《水户黄门》便是他的传说之一。他尊崇儒学、在文教政策上，重用朱舜水、弘扬儒学、并在自己的藩内实践。他将编纂《大日本史》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但另一方面，德川光国很早就对孔庙的建设以及祭孔活动抱有兴趣。并实际参与其中。以下是林鹅峰在宽文5（1665）年3月赴德川光国的参议邸参观时的日记：

及曰今夏赐官暇归水户则可建圣堂，中华历儒配位事既陈，本朝圣堂以本朝儒者为配位而可也，然本朝无真儒，唯惺窝·罗山二人而已，以二人神主为配云云……⁷。

从这里可以看出德川光国对圣堂的建设早有计划，并就日本儒者藤原惺窝及林罗山为神主进行祭祀的事宜与林鹅峰商议。

⁴ 《中山目录》堀杏庵，“学校问答”587-590页。

⁵ 据《昌平志》记载：“宽永七年庚午冬，大猷大君赐林信胜莊地五千三百五十三坪併二百金，以兴学舍。”犬冢逊《昌平志》卷1，《日本教育文库学校篇》，日本图书中心，1977年）30页。《大猷院殿御实纪》卷16中的宽永七年冬条亦有记载。

⁶ 犬冢逊《昌平志》卷1，《日本教育文库学校篇》，日本图书中心，1977年）P30。《大猷院殿御实纪》卷16宽永九年条亦有记载。

⁷ 林鹅峰《国史馆目录》（史料编纂《国史馆目录》第一，山本武夫校订，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97年9月），103页。

也就在宽文5年这一年，德川光国将明朝遗儒朱舜水从长崎接到江户，作为“宾师”加以礼遇。宽文10（1670）年，光国令朱舜水制作“学宫图说”，并以设计图三十分之一的比例制作了缩小版的“学宫”模型。该模型忠实再现了文庙、启圣宫、明伦堂、尊经阁、学舍、进贤楼、廊庑、射圃、门楼、墙垣的样子。可以看出德川光国有意采纳明朝的庙学制设立学校。宽文12（1672）年，光国在水戸藩设立了编纂《大日本史》的史館“彰考馆”，并确立了建设孔庙的计划。德川光国命朱舜水就祭孔礼仪及祭祀器物等进行详细考订，朱舜水作《改定释奠仪注》，就三献官的官职、祭祀的过程、四配、奏乐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述。此外，延宝元年（1673），朱舜水在江户驹笼带领水戸藩士举行了祭孔的练习。对于当时的情形《朱舜水记事纂录》中有以下记载：

延宝元年，公将造大成殿于府下，假设殿堂于江户驹笼别荘，使家士就朱之瑜习释奠，启圣公祭及祠堂墓祭仪节。⁸

朱舜水临时设立圣堂，演习祭孔的仪式——释奠，并进行了讲学。仪式中所用的朝服、角带、野服、道服、明道巾、纱帽等都在朱舜水的指导下仿照明朝的衣冠制作的。释奠礼演习的举行离不开德川光国的支持，德川光国礼遇朱舜水，有意识地引进当时明朝的礼仪制度，其目的何在呢？这一点从德川光国的随笔中可以找到答案：

国设学校之事，乃三代遗法，天道之本。……其家中诸士，勤务繁多，难行定日会集之事。然停其职务，使之仿书生行事，亦为不妥。……士各有职，难于一同。况有志者寡，无志者众。此世之大患。唐土之民有才学者，登科及第，录用为官，故大小学问盛行。日本不行及第取士之法，唯造孔庙、尊祭先圣之事易行。诸侯有志者，可造一两所讲堂，置儒者，广集好学之士，举其能勤者，方为良策。彼之制度、科场作法，甚为难行之事。⁹

光国认为在日本设立学校、对武士施行学问教育十分必要。然而，日本的武士与中国的书生不同，做学问并非其主要职能，让武士放弃职务一心去读书是不现实的。而且在日本实行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十分困难。于是光国认为应该首先设立孔庙，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进而设立讲堂，安排儒者讲学，以此来达到逐渐凝聚人心的作用。可见，光国将祭孔作为普及儒学教育的手段加以利用和

⁸ 《朱舜水记事纂录》别卷（吉川弘文馆）3~4页。

⁹ 德川光国《西山公随笔》（《日本随笔大成》第二期，14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57年），385页。引文系笔者译，原文为：国に学校を設る事は、三代の遺法にして、天道の本とする所なり。…其家中の諸士、おのおの役義番等のつとめ多ければ、日を定めて会集する事あたわず。職務を止て書生のごとくに勤よとは言べからず。…士は職務ありて一同しがたし。いわんやころざし有はすくなく、志しなきは多きおや。これ世の大患なり。唐にては民の学才あるものを及第のうへにて、官にのぼせ登庸するによりて、大小学問さかなり。日本にては及第取士の法行はるべからず。ただ孔廟を作りて先聖を祭り尊ぶ事はなりやすし。志しあらん諸侯は、講堂を一兩所に作りて、儒者を愛に置き、学を好む士はあつまれと、広く言ふれて、よく勤る人を取あぐるより外はなし。かの辟の制度、科場の作法は、甚だ行はれがたき事也。

引进。

除此之外，光国还曾参加林家的释奠。《昌平志》延宝3（1675）年条记载：

三年乙卯八月，释菜孔庙，水戸公源光国，右近大夫永井尚征，来观礼¹⁰。

除了德川光国，以御三家为首，各大名中均有人积极参加幕府的祭孔相关活动。从《昌平志》礼器志中亦可见一斑。如：

列侯各藉封地之饶，戮力于盛举，以致美于一器、……¹¹

圣堂中的礼器均为各藩主所进献。尤其是元禄年间，各大名纷纷响应幕府号召，尊儒崇儒。总之，日本的地方统治者对近世日本祭孔的发展亦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德川纲吉的崇儒与兴儒

德川纲吉是德川幕府第5代将军，在其任将军之时，大力尊崇儒学，其统治的时代，被称为“天和之治”，他重用儒官新井白石，努力推行“文教政治”。另一方面，他推行“生类怜悯”，也遭致各种非议。但他崇尚儒学，建立汤岛圣堂，是幕府将军中特立独行的人物之一。纲吉是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第四子，从小聪颖过人。深得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宠爱。其父德川家光担心若不严加管约束，有可能僭越其兄长，招致意想不到的灾祸。《常宪院殿御实纪》记载：

斯者生立，万事皆以谦逊为本。¹²

德川家光对长子继承制的肯定与其继位之前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在这里不作详述。就怎样培养德川纲吉的谦逊人格，防止飞扬跋扈，家光曾经这样对纲吉的生母·秋野（桂昌院）讲道：

吾生于战国之世，自幼专精武技，未能力于文学，年若受继大统，素无暇读书，今至行天下大小之机务，夙夜劳心，临事之时悔不能文学者甚多……以文学为第一先务教之，莫使日后为悔。母君涕下，……¹³

¹⁰ 《昌平志》卷2，事实志，58页。

¹¹ 《昌平志》卷3，礼器志，97页。

¹² 《常宪院殿御实纪》附录卷上（《国史大系》第12卷，《德川实纪》第4编，1903年），988页。引文系笔者译，原文为：かかるもの生し立むには、何事も謙遜をもて宗とすべしと仰られしとなり。

¹³ 《常宪院殿御实纪》附录卷上（《国史大系》第12卷，《德川实纪》第4编，1903年），988页。引文系笔者译，原文为：われは戦国の世に生れあひて、幼より専ら武技をのみ研精し、文学にをいては力を用ざるのみならず、年若くて大統を

在这里，家光后悔自己只善武艺不善文学之事，并叮嘱桂昌院对德川纲吉实行良好的文学教育。此处的“文学”指以儒学为主的学问。桂昌院根据这一教育方针对纲吉进行了儒学教育。事实上，从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的时代起武家就开始重视“学文”了。德川家康于元和元年（1615）制定的近世日本的重要法律性文件《武家诸法度》的第一条便是：“文武弓马之道专可相嗜事”。在强调武艺的同时提倡文学修养的必要。在这样的风气中，擅长文事的将军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纲吉当上将军后，非常重视讲学，讲学的内容为儒家经典。延宝8（1680）年9月，纲吉召见林信笃，听其讲解《大学》。此后每月举行三次讲学（講筵）。从元禄6（1693）年到元禄13（1700）年的8年间，共累计讲学240次。由此可以推算几乎大名的每次登城都会进行讲学。¹⁴ 讲学仪式中，除了家门、谱代、外样¹⁵等诸大名外，还允许旗本、御家人，甚至各宗派的高僧、社人、山伏以及儒生等前来听讲。《常宪院殿御实纪》记载：

日光门主为始，家门、国持、普第诸大名、旗本、其他参向公卿及诸寺高僧、硕德、社人、山伏又陪臣之属，稍有好学志者，皆许其拜听……¹⁶

据说德川纲吉尤其擅长《孝经》、《大学》的讲义，并能流利朗读朱注。在讲学中最频繁开讲的是《周易》。纲吉除了在城中举行例行讲学会以外，还多次亲赴柳泽氏等大名宅邸，亲自讲书，并听取大名或家臣的讲解、讨论。此外，在年初勅使来到江户时，将其召至城中，以设宴的名义给其讲书。可以说，德川纲吉在城内举行讲学，组织大名听讲以及参加祭孔仪式，其目的是为了推行儒学教育，改变杀伐的社会风气，进而维护其统治的和平与安定。

除了在城中或大名的宅邸举行讲书之外，纲吉还多次在圣庙举行讲学仪式。元禄元年（1688）11月21日，纲吉来到孔庙，与近臣一起听了信笃的讲学。《昌平志》载：

命信笃进讲尧典，近侍诸臣咸陪听焉，亦用宽永故事也，讲罢赐宴，猿乐人奏伎，大君欢甚，因起自舞。¹⁷

受継しかば、元より読書の暇もなかりしが、今天下大小の機務をとり行ふに至りて、夙夜に心を勞すといへども、文学のたらざるをもて、事に臨み折にふれて悔る事少なからず……これを教むには第一文学をもて先務とし、年たけて悔る事あらしむたと仰られければ、母君も御涙うかめてかしくみ給ひ、……

¹⁴ 江户时期将军为巩固幕府统治，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统治的措施。1635年，德川家光修改武家诸法度，设立参勤交代制度，该制规定各藩大名每年都要有一段时间在江户辅佐幕府将军。其中，一些重要的藩国大名，如水户德川家等部分亲藩大名（御三家）及部分谱代大名，以及部分离江户不远的领土不大的大名，要求长期留守在江户，这些被称为“定府”。规定住在江户的大名要定期登城面见将军，为每月的1日、15日、28日。此外像年初、五节句（规定24节气中节日）、八朔（八月一日：家康入主江户城的纪念日）等举行仪式的日子也要登城。从《常宪院殿御实纪》所记载的纲吉的讲学次数推算，大名每次登城都要听其讲学。

¹⁵ 外样大名指的是关原之战前与德川家康同为大名的人，或战时曾忠于丰臣秀吉战后降服的大名。

¹⁶ 《常宪院殿御实纪》附录卷中（《国史大系》第12卷，《德川实纪》第4编，1903年），995页。引文系笔者译，原文为：日光門主はじめ、家門、国持、普第の諸大名、旗本、その他参向の公卿及び諸寺の高僧、碩德、社人、山伏または陪臣のともがらまで、いささか好學の志ある者は、皆ねがひのままに拝聴せしめられ、……

¹⁷ 《昌平志》卷二，事实志，60页。

元禄3（1690）年8月，纲吉聚集老中以下诸役人，亲自讲解《大学》。元禄4（1691）年汤岛圣堂重建后，纲吉于2月11亲赴圣堂参观察孔仪式的释奠，随后来到行殿亲自讲解经书，并听取了林凤冈的讲书¹⁸。同年，林凤冈在圣堂的仰高门的东舍举行公开的讲学，共聚集士庶三百人，舍内人满，无法进入舍内的人席地而坐，盛况空前。凤冈这样感慨道：

我讲说有年矣，而人众盛多，未见如今日，实文教所致也。¹⁹

从此，仰高门的讲解经书成为惯例。这样，德川纲吉通过讲学的形式向天下宣告了幕府对儒学的尊崇。林家的圣堂也成为了讲学的场所之一。纲吉亲自执讲，或命儒者、家臣执讲，其对儒学的热心带来了世间崇儒好文的风气。

除此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德川纲吉对汤岛圣堂的建造。元禄元年（1688）10月，纲吉曾率老中阿部丰后守正武、戸田山城守忠政、土屋相模守政直、牧野备后守成贞等，着盛装拜谒先圣殿。元禄3（1690）年，纲吉下令重新选择场所重建孔子庙。关于重建的理由，《昌平志》中有下述记载：

孔庙之设，原创于尾张公，而累朝因以加崇隆然，义不本于朝典，殆有阙于盛心。²⁰

由于忍冈的孔子庙是尾张德川义直所建，并非幕府的营建，所以幕府对文治尊崇的意图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且地逼寺刹，缙流接踪，夫薰犹不同器，矧儒佛同境乎。”²¹即孔子庙所在地毗邻东叡山宽永寺，纲吉认为儒学建筑物与佛教建筑物同处一地极为不妥，欲使儒学与佛教划清界限。新庙殿建在“汤岛”这处地方，于元禄4（1691）年竣工，随后将忍冈的圣像及四配像移至汤岛新庙，举行了迁座奉告仪式。《昌平志》记载：

四年辛未正月，新庙落成，二月七日奉迁神位，命大学头林信笃致告，……大功报完其庙殿制，规模雄伟，门庑厨廊举以法，故又置行殿、正厅、黉舍、吏房，凡数百楹，碁布并列，其极轮奂，庙学之盛起此。²²

由此可见，新建的汤岛圣堂规模要比之前的先圣殿大很多。“当此之时，天下翕然知崇圣，喁然仰文治，大小诸侯皆承盛意，各制礼器购经籍，以赞成其举……”²³圣堂成为幕府重视文治的标志，诸大名积极奉纳礼器与经典，以响应幕府的文治政策。

¹⁸ “释奠孔庙，常宪大君谒孔庙，临观察仪，移仗行殿亲讲经义。”《昌平志》卷二，事实志，62页。

¹⁹ 《昌平志》卷二，事实志，64页。

²⁰ 《昌平志》卷二，事实志，61页。

²¹ 《昌平志》卷二，事实志，61页。

²² 《宪庙实录》（内阁文库藏）《常宪院殿御实纪》卷23，“元禄4年2月11日条”的记录。

²³ 《昌平志》卷二，事实志，62页。

元禄4（1691）年2月，新圣堂首次举行祭孔仪式——释奠，纲吉盛装步入大成殿，亲自烧香、礼拜，参观释奠礼。元禄6（1693）年以后，每年春季的祭孔仪式将军都会亲临，秋季祭孔则准许尊崇儒学的诸大名前来参加。例如元禄6（1693）年8月的释奠中，就有四十多位大名藩主盛装参加。

除此之外，纲吉命令林凤冈蓄发，将其任命为“大学头”，并赠与林家“祭田千石”，用来弥补举行祭孔所需的费用。并下令林家子孙后代可继承祭孔仪式的“主祀”一职。纲吉时代之前，忍冈先圣殿的祭孔属于林家的私人祭典，而此后祭孔的性质发生了很明显的转变，开始作为林家的“公职”，受到幕府的干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近世前期日本祭孔具有一个特点，即包括将军、藩主在内的统治者积极参与了祭孔仪式，而日本近世以前的祭孔活动中却鲜有统治者的参与。在中国与朝鲜历史上，祭孔活动作为正统学问思想的代表，具有维护统治者正统地位的意义。尽管近世日本的祭孔仪式与此有所不同，但当时的统治者还是有意识地将祭孔仪式当做了实现教化、加强武士教育、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参考文献：

- 1、《昌平志》
- 2、《日本教育文库 学校篇》，日本图书中心，1977年。
- 3、《国史大系》第12卷
- 4、小松原涛《陈元赞研究》雄山阁出版，1972年。
- 5、笠井助治《近世藩校的综合研究》、吉川弘文馆，1960年

（此论文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资助项目：“近世日本祭孔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邢永凤：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日语系主任）

（李月珊：日本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学生）